



大型系列报道

让历史照亮未来

美丽河北

人文之美

河北省宣传部 联合举办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

不难看出,毗卢寺壁画中的每个场景、每个细节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才最终确定的。在壁画绘制过程中,画师们的用线灵活多变,起伏轻重间尽显功力,生动自然,颇有吴带当风之神韵。

我第一次走进毗卢寺,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当时的我还不到20岁。

那是一个周末,我骑自行车回平山老家,路过毗卢寺时,特意从大桥上拐了进去。寺门紧闭,我用手轻轻敲了几下,没多久,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探出头来,很疑惑地望着我。我掏出崭新的工作证,双手递给他:我喜欢美术,想看看里面的壁画。

他把门打开并告诉我,石家庄市群艺馆的同志正在做后殿壁画临摹,今天休息,没有来画。我跟着他来到后殿,推开殿门,迎面便是三尊佛像,因光线很暗,大殿墙壁上的壁画看不太清楚。当眼睛适应了寺内幽暗的光线时,那些壁画好像突然脱壁而出,我瞬间惊呆了,实在想不出那些生动的人物造型,灵动的线条和典雅的色彩,古人是怎么构思出来,又怎么摹绘上去的。

之后,我曾多次陪着艺术界的老师和同行观摩毗卢寺壁画,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和感悟。

毗卢殿前有两棵千年古柏,它们见证了毗卢寺的兴衰,目睹了那些绘制壁画的画师忙碌的身影,至今依然生机勃勃。每次凝望着古柏,我都肃然起敬。随着一次次地走近毗卢寺,我对这座寺院和壁画的了解也渐渐多了起来。

毗卢寺始建于唐天宝年间(742-756年),现存古建筑只有释迦殿和毗卢殿(天王殿在1959年加宽石津渠时被拆除了)。钟楼、鼓楼是三十年前在原址按原貌重建的。据毗卢殿重修碑记和题刻可知,毗卢寺在宋、金、元、明、清时期都曾重修过。其中,大规模重修有两次。一次是元至正二年(1342年),一次是明弘治八年(1495年)至嘉靖十四年(1535年)。第二次历经四十年,重修后的毗卢寺雕梁画栋、殿宇庄严,是最兴盛的时期。现在,我们看到的毗卢殿(后殿)壁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毗卢寺壁画,应该就是在第二次修缮时绘制的。

释迦殿壁画绘佛本生故事,壁画面积约83平方米。据碑刻和题记可知,释迦殿壁画绘制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至嘉靖十四年(1535年)间。后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和道光六年(1826年)还有重绘、补绘。

在大殿东壁上,有内层壁画裸露,绘的是黑色边框,感觉和后殿壁画的边框很相似,有可能和毗卢殿壁画是同一时期同一批画师绘制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释迦殿壁画,当是后来重绘补绘的。

毗卢殿为正殿,俗称五花八角殿。建在一米高的月台上,前后有抱厦,平面呈十字形。殿内供奉泥塑毗卢佛一尊,旁有明代石佛两尊,殿内满绘壁画,面积120多平方米,内容为水陆画。

水陆画是举办水陆法会(又称为水陆道场)时悬挂用的,山西右玉县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可作为其典型代表。后来,也有直接将水陆画绘于墙壁上的,毗卢寺壁画便是后者。此外,山西稷山青龙寺绘有元代水陆画,浑源永安寺绘有明代水陆画,河北怀安昭化寺绘有明代水陆画。

毗卢殿壁画依傍题,分为122组。诸神上下分为三层,下层神像为全身,高约一米,中上层神像依次减小,多为大半身,高约半米。每组人物三五成群,用祥云连接、分割。人物有儒释道三教各类人物等500多个。佛教人物主要分布在北壁,道教人物主要分布在东、西两壁;儒教人物主要分布在南壁。自唐开始,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延续了近千年,毗卢寺壁画是其发展进程的形象体现,也可以说是三教合流水陆画的典型代表。

从整个大殿壁画的布局和艺术效果来看,应该是由当时一流的画师为它专门设计,量身定做的。从画面上极少能看到起稿线的情况分析,壁画是依据绘制好的原大粉本完成的。其布局合理,主次分明,人物安排井然有序,各组壁画用祥云衬托托,相连接,相分隔,即使整个画面更生动,又增加了神秘感。人物比例适度,形象组合得体,反映了画师娴熟的绘画技艺。

不难看出,毗卢寺壁画中的每个场景、每个细节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才最终确定的。在壁画绘制过程中,画师们的用线灵活多变,起伏轻重间尽显功力,生动自然,颇有吴带当风之神韵。

驰名中外的北京明代法海寺,是皇家寺院,那些壁画主要是由宫廷画师绘制完成的,是典型的工笔重彩画。线条极为细密工整,设色华丽,贴金、描金兼用,所绘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洋溢着皇家气息,是不可多得的古代壁画艺术珍品。但是,毗卢寺壁画和它相比,画风明显不同,线条有写意性,人物更显生动,更有活力,感觉更接地气。

毗卢寺坐落在石家庄市区的西北的上京村东,规模不大,但在我国艺术界和壁画史上,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上世纪80年代,毗卢寺壁画摹本先后到国内外多地展出,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毗卢寺壁画内容丰富,技艺精湛,堪称明代绘画的经典之作。至今,人们谈论古代壁画时,也经常会说毗卢寺壁画。可以说,它早已是燕赵大地上一张耀眼的名片了。

毗卢大画

□郝建文



毗卢寺东壁画(局部)

二 毗卢寺壁画最精妙处,便是每幅画都有自己的特色,每幅画都栩栩如生、妙意横生。

毗卢寺壁画色彩以朱砂、石绿为主,和谐典雅。由于主要使用的是矿物质颜料,所以,虽然历经数百年,但色彩依然鲜艳。画师的表现手法多样,如壁画中的金属部位,用沥粉贴金的工艺来表现,呈现出良好的质感。整个壁画看上去富丽堂皇,施色十分灵活,晕染和平涂结合。晕染的部位看上去很透亮,展现出极强的立体感、质感和量感,有凹凸变化,平涂的部位看上去则很厚重,但并不呆板。

仔细观察,画师不是完全沿着轮廓内侧一丝不苟地进行涂色的,有的颜色边缘距内轮廓线还有一定的距离,显得很灵动。尤其当观者站在一定的距离观看时,线条与颜色之间,像用淡色复勾似的,煞是提神。壁画中面部、手等有皮肤的部位,复勾均采用赭石色,和晕染的颜色相当和谐。

毗卢寺壁画最精妙处,便是每幅画都有自己的特色,每幅画都栩栩如生、妙意横生。

东壁北侧下部的《南极长生大帝》(也就是后来民间流行的老寿星)极见功力,我曾现场做临摹草稿,有机会细细揣摩古代画师的用心和运笔,收获颇丰。我为古人在细节上的刻画功力惊叹不已。这幅画用细致入微、评价,最合适不过。人物毛发轻入轻出,有毛根出肉之感,线条有粗细虚实变化,再辅以淡墨晕染,显得更加真实自然。沥粉的线条很挺拔,不粗不细,和那些墨线巧妙融为一体。红袍宽袖和领口上的花边,也十分精致,黑背景前那些花朵、小绿叶,局部都用白色提边,能在逆光情况下产生轮廓光的效果。

南极长生大帝身上的花纹处理得极为用心,那些白色圆点组成的圆圈,更有独特味道,当是先用红色把圆圈画出来,再在上面点上白点。这样一来,和那些白色条状的花纹相比,更加醒目,画面便又多了一个层次。红袍衣纹,画师在着色时没有刻意去留,仅是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朱砂色,使得那些线条并不突兀,颜色和谐,画面整体感很强。

三 不可否认,壁画终有寿命,也许有一天会化为泥土。但是,如何保护好壁画,延长它的寿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尽可能看到它的真容,是我们每个文物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是谁创造了这么精美生动、令人惊叹的壁画呢?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画家,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顾恺之、陆探微、杨子华,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王维、韩干、周昉,五代的周文矩、张图,宋代的高益、高文进、武宗元等人都曾挥毫引翰,竞技于寺观粉壁之前。随着以写意为主的文人画的出现,士大夫、文人画家纷纷不屑于壁画的创作,逐渐退出了这一舞台。到了宋代以后,寺观壁画多为民间画师所绘,毗卢寺壁画便是由民间画师绘制完成的。

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毗卢寺重修碑文中明确记载铁匠、泥水匠、木匠、画匠姓名。其中,画匠有(真定府)王淮、张保、何安、宋太。在已有文献中基本找不到这些画师的资料,更不知道他们师从何人,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不过,想来,能有如此高超、娴熟的绘画技艺,天分不可少,后天的努力肯定也不可少,他们一定画过很多寺庙壁画,下过很多苦功夫。或许,毗卢寺壁画是他们一生中值得骄傲的作品吧。

近500年沧桑岁月,自然或人为的

损坏,使得壁画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北壁西侧那尊形态优美的摩利支天菩萨,30年前,它的画面完整且色彩鲜艳,而现在,墙皮脱落、壁画褪色,人物形象残缺不全,让人心痛。

据了解,早在1947年,土改工作队就对毗卢寺壁画进行了保护,使其没有遭到破坏。1954年3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将毗卢寺列入保护对象;1956年,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将毗卢寺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河北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毗卢寺仍在其中;1995年,毗卢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陪着国家文物局科技专家组陆寿麟先生到毗卢寺参观,他看到壁画酥碱和起甲,很着急,说应该尽早做方案上报,尽快做壁画保护。近年来,石家庄市毗卢寺博物院为壁画保护做了很多努力,邀请敦煌研究院做了毗卢寺壁画数字采集及病害的检测和分析,制定壁画保护方案,对壁画进行了科学保护工作。壁画数字化保护工程是为了抢救性保护,因为壁画受环境、气候、温度影响大,而壁画数字化

则可以原汁原味地保存壁画的原始素材,越早数字化,资料保存就越详实。毗卢寺博物院专门请来国内最权威的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壁画进行全方位、高精度的信息采集,再拼接处理成整幅的全景图像,达到1:1的比例精确体现壁画原貌。

文物保护不是仿古重修,而是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地使其恢复原貌,绝不人为地去补充上色。毗卢寺壁画的修复保护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壁画保护期间,我曾多次去现场观摩,看着壁画修复人员仔仔细细地去除壁画上鸟粪等附着物,对酥碱、起甲壁画进行加固,对脱落部位进行修补。保护修复后的壁画,线条色彩更清晰,整座毗卢寺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不可否认,壁画终有寿命,也许有一天会化为泥土。但是,如何保护好壁画,延长它的寿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尽可能看到它的真容,是我们每个文物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本版图片均由石家庄市毗卢寺博物院提供)



毗卢寺

「申遗」成功只是保护的开始

□吴学安

去年我国可可西里、鼓浪屿申遗成功带来的关注热度仍未褪去,7月2日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又审议通过将中国贵州铜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梵净山成为我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在专家看来,因为申遗过程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景区在申遗成功后调高票价、加速商业开发相对正常,但实际上,过去多年,世界遗产对于各地的游客吸引力普遍被高估了,地方政府和运营方即使要开发,也一定要把握好度,以免触碰红线影响来之不易的申遗结果(7月3日《北京商报》)。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不属于任何个人,也不属于所在地政府。世界遗产地的居民,只是它的守护者,而不是所有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首先拥有的是责任,我们所被赋予的权利,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守望这些人类的共同历史记忆。显然,在保护和利用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做出保护优先的选择,这一选择艰难而神圣。同时,世界遗产的保护需要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这也是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的严峻考验。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

早在2007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因为旅游业过度开发、遗产地不堪重负,中国曾有包括丽江古城、故宫、颐和园在内的6处世界遗产被亮黄牌。而武当复真观改建成三星级宾馆事件、曲阜孔庙水洗事件、故宫星巴克事件,都在媒体曝光后引起舆论哗然。世界遗产被过度开发,事件频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地政府对申遗的目的并不单纯,甚至是以申遗作为旅游开发的无形资源。重开发,轻保护,已经让许多自然和文化遗产遭到了不可恢复性破坏,这样的教训足以使后来者刻骨铭心。

近年来,中国申遗的成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实体及其保护管理的认同与肯定,无疑这是巨大的荣誉,可喜可贺。然而,如何进一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依然任重道远。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把如何利用世界遗产的名头获取经济收益当作首要目的,忽视了科学传承和保护,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申遗成功只是第一步,有效计划,加强管理才是关键。一方面,按照世界遗产保护的相关规定以及保护承诺等要求,当地相关部门应制定出科学的保护传承规划,并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在专家论证、民意征询的基础上,出台科学的保护和传承方案,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另一方面,逐步加大对世遗保护传承的支持力度,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多方利用联合国专项保护基金等,为世遗的保护传承奠定扎实的基础。

毋庸置疑,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众望所归。但申遗不是目的,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申遗是保护的开始,不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造。我们应尽快从申遗成功的狂欢中冷静下来,踏实做好遗产保护规划才是关键。



□主持人 韩莉

●李国新:公共文化示范区的责任重大

公共文化示范区的责任不仅在于探索出有示范效应的先进经验,更进一步,需要加强各地、各区域之间的交流、研讨和碰撞,将好经验进行提升、复制和推广。

6月28日《人民日报》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已有120座城市建成或将建成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各地都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有益经验。在日前召开的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区域联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效能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国新表示,公共文化示范区的经验还有待进一步推广,多地经验需要充分地交流和对比,从而促进联动发展。

●王隽:剧院与艺术节的关系将越来越紧密

怎样寻求更好的艺术创作,怎样展示更好的文艺样式,需要艺术节、剧院相互刺激,相互鼓励,一起携手去完成。

7月3日《新民晚报》7月1日至2日,2018世界剧院运营及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在谈到剧院运营及表演艺术行业的未来时,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王隽表示,未来,剧院或将与艺术节产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也会成为培养观众的重要组合。艺术节作为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公共文化平台并没有固定场地,而剧场主打的就是演出空间,艺术节在入驻剧场表演节目之外,还有很多打破围墙走到户外空间来进行艺术服务和艺术推送的活动,也会给剧场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艺术能量。

●励小捷:要辩证看待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保护与利用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比如古建筑,封闭起来不用反而会加速其损坏,对保存状况已经十分脆弱的文物,应该有限制地利用。

6月28日新华社近日,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第三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论坛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表示,文物保护与利用可以相互促进,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转化,要辩证看待它们的关系。他认为,文物利用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个要素:一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目的,二是有利于增进对遗产的认识和理解,三是利用与保护应该是统一的。比如,文旅结合已经是文物保护利用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经营性利用带来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管理、规范利用行为来避免和解决,不能因噎废食。

●蒋勇:观众对电影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观众多元化的观影口味和日渐增长的观影水平,对电影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7月4日《新京报》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数据,截至6月30日,今年全国总票房达到320.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18%。其中,国产电影的票房达到189.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0%。电影市场专家蒋勇认为,随着观众的观影口味日益提升,更多高质量的电影加速涌现,电影越来越回归内容本身,没有质量保证的电影很容易被观众抛弃,上半年依赖商业运作、营销炒作、票补电商支援的影片数目明显下降,口碑对票房的影响越来越大。

